

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

张捷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

张 捷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028号

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

张捷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地质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32开本 9.125印张 233千字

印数0001—1200

1994年6月第一版 1994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527-8/I·59 定价:9.6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文学界的“内战”	(4)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	(4)
第二节 “内战”的爆发和两大派的主要分歧	(17)
第三节 “内战”的升级和斗争重心的转移	(34)
第四节 “八·一九事件”前后的苏联文学界	(51)
第二章 文学思潮和理论论争	(65)
第一节 关于“写真实”论和“全人类价值优先”论	(66)
第二节 驳文学“私有化”的口号	(78)
第三节 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	(89)
第四节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	(103)
第三章 文学创作的现状	(123)
第一节 第一阶段的创作	(124)
第二节 第二阶段的创作概述	(140)
第三节 纪实文学的发展	(158)
第四节 “新潮文学”及其他	(173)
第四章 “回归文学”	(190)
第一节 “回归文学”的概况以及其中的“被耽搁文学”	(191)
第二节 “返回的文学”	(207)
第三节 侨民文学	(226)
第四节 关于“回归文学”的评价问题	(243)
结束语	(260)
附录 苏联文学最后七年纪事 (1985—1991)	(264)
后记	(284)

引 言

有七十余年历史的苏联文学，走完了它最后七年的路程。

1989年卡巴科夫曾在他的中篇小说《叛逃者》中对苏联的社会政治状况作了“预测”。根据小说的描写，到1993年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国内形势很不稳定，社会秩序极其混乱。当时有人认为这只是一部意在告诫人们制止内乱以防上述情况发生的“反乌托邦小说”。不幸的是，小说描写的情况已提前成为现实。随着苏联的解体，统一的、多民族的苏联文学已不再存在。1990年，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就为他心目中并不存在的苏联文学唱起了挽歌。此人未免过于急躁，当时曾招来一些非议。但是现在他尽可以放心地歌唱而不必担心受指责了。

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1985年—1991年）是很不寻常的七年。在这七年里，文学界各种思潮蜂起，各派力量进行了重新组合，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内战”连绵不断。文学创作受到各种冲击和来自各方面的挤压而停滞不前，水平和格调不断降低。过去得到公认的成就遭到怀疑和否定，过去受人崇拜的某些文学偶像被钉上十字架……总之，这七年是苏联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动荡不安的七年，是文学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七年。

“改革”——多么诱人的字眼！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广大苏联作家，积极投入了1985年开始的那场运动。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最后竟落得这样的结果。而那些“文学活动家”们，在政治活动家的支持、鼓励和怂恿下，利用他们控制的报刊大造舆论。他们发表了大量全盘否定斯大林、以至攻击列宁、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学

作品和政论文章。于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大概是这七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改革”伊始，许多作家曾以为通过破除各种清规戒律和不合理的限制，将会得到更多的创作自由，从而创作会更加繁荣起来。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发现，虽然“政治的检查”取消了，但是出现了“市场的检查”，创作并未获得自由。如今作家们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退回到列宁说过的“依赖钱袋”的状态。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正在下降，文学的处境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困难了。这个结局，可能也是许多作家始料不及的。目前，文学的观念、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中，苏联文学的一些固有的本质特征正在消失，正在出现不同于它的另一种文学，“大众文化”的影响愈来愈大，宣扬暴力和色情的东西正在不断出现。如果所有这些东西占了主导地位，那么就连苏联文学的传统也要中断了。

面对苏联文学的这种状况，本书作者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对苏联文学有感情的多年的读者，希望目前的危机是它的一个必须经过的炼狱，希望苏联文学这只自焚的凤凰将会在烈火中获得新生；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又必须承认苏联解体、苏联文学也已画了句号的事实，需要像一个大夫一样，用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分析苏联文学的病因和死因，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本书作者不打算为它唱凄凄切切的挽歌。在行文中将尽可能抑制情感的因素，客观冷静地叙述和分析苏联文学最后七年的历程，作出尽可能符合实际的判断。但是能否做到这一点，尚无把握。

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时间虽不算长，但是极其复杂。在这七年间，几乎把苏联文学史上存在过的矛盾和斗争全部重新翻了出来；许多作家和作品的“回归”，使得文学报刊上出现了“几代同堂”的奇特景象。因此，尽管本书将把叙述的范围严格限制在1985年至1991年这七年内，但是有时为了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需要“频频回首”，不免会使得叙述显得有些凌乱累赘。这是需要恳请读者谅解的。

上面已经提到过，这几年苏联文学政治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与政治斗争结合得非常紧密。因此，尽管本书作者主观上希望尽可能少谈政治，专讲文学本身，但是看来这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那样做，不符合这几年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就不能不对社会政治斗争有所涉及，甚至有时讲得较多。再说一遍，并不是本书作者有意要多讲那些被有些人认为属于文学“外部规律”的东西，而是迫不得已，这又是要恳请读者谅解的。

要对苏联文学最后七年走过的路程作全面的、准确的把握和剖析并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尚须时日。这要求对这段时间内的情况作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还要求对苏联文学史各个阶段存在的问题作出新的判断，对苏联文学史的总体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在短时间内无疑是很难做到的。本书只能根据作者所了解的情况和掌握的材料，给这七年的历程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给进一步研究提供某些线索。如果它对关心苏联文学的命运的同志们了解这个阶段有所帮助，那就算完成了任务。

第一章 文学界的“内战”

“奥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道：“奥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改革”以来的苏联文学界，就像“一切都乱了”的奥勃朗斯基之家。

“改革”前表面上保持“团结一致”的文学界，其实内部矛盾重重，各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六十年代形成的三大派，即正统派、自由派和传统派之间的斗争重新表面化，旧日的积怨和新的分歧一起爆发出来，形成“内战”连绵不断的局面。不过正统派已无昔日的力量而依附于传统派；自由派扩大了队伍而自称为“改革派”，因此实际上进行“内战”的是两大派。这两大派的“内战”从1987年正式揭开序幕至今仍未停息，大部分作家都卷了进去，这场斗争集中体现了文学界存在的矛盾，构成了这几年文学生活的重要内容。叙述两大派的“内战”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叙述这几年的文学斗争史。为了说明这几年文学界斗争的来龙去脉，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

苏共二十大后文学界的变化。——《新世界》和《十月》之争。——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及其内部的分化。——传统派的崛起以及《新世界》和《青年近卫军》之争。——雅科夫列夫的介入。——七十年代文学界各派力量对比的

变化。——对洛巴诺夫的《解放》一文的批判。——文集《大都会》事件。——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创作情况。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后果，在苏联作家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反对个人崇拜虽然对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活跃思想和繁荣创作来说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也引起了思想混乱。文学界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随之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一批老作家开始转向，思想上和创作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批当时崭露头角的新作家自称为“二十大的产儿”，

“不仅怀疑斯大林的价值，而且也怀疑全部过去的历史”（叶夫图申科语）。这几类人逐步成为苏联文学界的自由派。他们在“写真实”的口号下，抹杀历史上取得的成就，专门写现实的阴暗面。他们宣扬“非英雄化”，反对表现英雄人物。1958年，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重新担任《新世界》杂志的主编，从此，《新世界》成为自由派的阵地。^①

与此同时，以柯切托夫为代表的正统派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他们主张写现实生活的光明面，反对抹黑；主张写英雄人物，反对“非英雄化”。1961年柯切托夫被任命为《十月》杂志主编，从此，《十月》成为正统派的论坛。

自由派和正统派利用各自掌握的舆论工具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论战。这就是著名的《新世界》与《十月》之争。这场争论涉及到了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争论双方确实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但也有宗派主义的东西。当时苏联官方反对“两个极端”，即既反对粉饰现实，又反对抹黑，对两派均采取批评态度。1967年1月27日《真理报》的社论《当落后于生活的时

^① 拉克申曾对“自由派”这一称呼提出异议。他说：“西方往往把《新世界》称为‘自由派’的杂志。我们表示过反对，说它不是自由派的，而是民主派的。”（《杂志的道路》，苏联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13页）但是“自由派”这一称呼已经广泛流行，因此本书仍采用这个叫法。

候》既批评《新世界》“过分侧重反面事实，对描写正面现象存在着戒心”，“把所谓的‘反英雄人物’放在首位”，也批评《十月》“对于苏联目前社会发展中明显的良好进展估计不足”，常以“简单化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在这之后，两派之间的斗争有所缓和。

应该指出，对苏联官方来说，两派都还没有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但是随着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自由派中的一些人加入了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引起当局的注意。他们分布在整个知识界，主要代表人物有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数学家沙法列维奇、遗传学家若列斯·梅德维杰夫、物理学家图尔钦、作家索尔仁尼琴、哲学家兼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评论家兼作家西尼亚夫斯基等。他们提出争取自由、保卫人权的口号，创办了一些地下刊物（例如加兰斯科夫主编的《凤凰》、奥西波夫出版的《飞去来器》、亚历山大·金兹堡出版的《句法》等），有些人把作品送往国外发表。苏联当局开头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进行镇压，先后逮捕了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布科夫斯基、加兰斯科夫等人，并判了刑。对索尔仁尼琴也采取了高压手段，先因他把作品送往国外发表而开除了他的作协会员籍，后因他在国外出版《古拉格群岛》而把他驱逐出国。

七十年代初，苏联当局放宽了对出国的限制，于是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先后到国外定居。这些人除把国内创作的作品带往国外发表外，还在国外继续进行创作，形成了侨民文学的“第三浪潮”。他们同留在国内的同道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应当指出的是，六十年代末，持不同政见者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1974年索尔仁尼琴和沙法列维奇等人编辑出版了文集《从大石块底下》，文集收入了索尔仁尼琴的三篇带有纲领性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在呼吸和意识恢复过程中》就是针对萨哈罗夫的。这

个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持不同政见者队伍的分裂——分裂为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和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俄罗斯派。两派的主要分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萨哈罗夫反对斯大林，提出恢复列宁的原则，当时尚未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理想；索尔仁尼琴认为斯大林只是列宁的继承者和列宁思想的忠实贯彻者，把矛头直接指向列宁，并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第二，萨哈罗夫对各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持不以为然的态度，索尔仁尼琴则强调俄罗斯民族的复兴；第三，萨哈罗夫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赞成多党制，索尔仁尼琴则认为过多的自由并无好处，赞成实行“开明的专制主义”。两派在苏联国内外均有其支持者。

六十年代下半期，还有一支力量在苏联文坛上崛起。崛起的背景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在苏联社会发生大的动荡后，一直在进行历史的反思。他们看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尤其是看到农村凋敝、俄罗斯民族的发祥地——古罗斯的东北部地区呈现衰败景象时，开始对十月革命后所走道路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他们还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俄罗斯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正在遭到巨大的冲击，因而更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发出了恢复俄罗斯民族意识、发扬俄罗斯民族传统、回到民族之根、拯救俄罗斯的呼唤。他们在探究救国救民的方案时把目光投向俄国的历史，于是掀起了一股复古风。许多人对过去的教堂、圣像和古代文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颂扬宗法制的的生活风习。这种情绪也影响了相当多的作家，尤其是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家。这些作家和批评家聚集在《青年近卫军》杂志的周围，这就是后来的传统派。1968年，《青年近卫军》杂志先后发表了恰尔马耶夫的文章《伟大的探索》（第3期）和《不可避免性》（第9期）以及洛巴诺夫的文章《文明的市绘》（第4期）。这些文章强调指出，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有教养”的人的精神退化是一种巨大的危险；文章的作者们颂扬俄国的过去，提出发扬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它是唯一能与“美国作风”（американизм）对抗

的力量，号召严格地划清各种思想体系的界限，并把这一点提到“历史必然性”的高度。与此同时，杂志还发表了一些颂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美化俄国的过去的诗歌和小说。

恰尔马耶夫和洛巴诺夫的文章发表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激烈的争论。不少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十余年来一直势不两立、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有重大分歧的《十月》和《新世界》，这时却一起对《青年近卫军》发起进攻。先是《十月》杂志副主编斯特罗科夫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批判文章（《十月》1968年第12期），接着《新世界》紧紧跟上，该杂志前副主编亚历山大·杰缅季耶夫发表了题为《论传统和人民性》的文章（1969年第4期）。杰缅季耶夫在文章中对恰尔马耶夫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大国主义的伪爱国主义，他们对俄国民族传统和民族性格的理解“更接近于斯拉夫派和乡土派的追随者”的理解，他们对俄罗斯民族的颂扬“离民族的傲慢和自大、离民族特殊性思想和俄罗斯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思想只有一步之遥”。杰缅季耶夫指责恰尔马耶夫等人在谈到俄罗斯和西方时用的是“斯拉夫派救世主说的语言”，过分夸大“美国作风”的诱惑，认为他们那样做会“把人民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与外来影响的斗争变为与创作探索和创作特点的斗争，滑到民族自我孤立的立场上去”。文章还批评了《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刊登的一些小说和诗歌，指责这些作品过分宣扬对古代教堂、圣像和古迹的爱，片面宣传对农村的眷恋和对城市的敌意。文章最后引用《苏共纲领》中的一段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话作为结束语，以此说明《青年近卫军》杂志背离了党的路线和方针。

杰缅季耶夫的文章引起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不满。阿列克谢耶夫、维库洛夫、沃罗宁、扎克鲁特金、阿纳托利·伊万诺夫、马拉什金、普罗科菲耶夫、普罗斯库林、谢尔盖·斯米尔诺夫、奇维利欣、顺季克等十一人（其中大多为传统派作家，但也有正

统派)在《星火画报》(1969年第30期)上发表题为《〈新世界〉杂志反对什么?》的公开信。公开信首先为《青年近卫军》杂志进行辩护,认为它一直为捍卫共产主义理想和以爱国主义传统教育青年的事业服务;接着指责《新世界》的文章缩小敌对思想影响的危险性,警告说,如果不与这种影响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将被世界主义思想所偷换。其他报刊,例如《苏维埃俄罗斯报》、《社会主义工业报》等,也纷纷发表文章和读者来信,对《新世界》提出批评。1969年8月27日,《文学报》发表题为《文学争论和责任感》的文章,肯定《青年近卫军》的文章和十一人的公开信“其实质是正确的”,批评杰缅季耶夫的文章“没有看到敌对思想的危害,未能认清否认民族特点的错误”,谴责《新世界》发表的某些作品“对爱国主义传统估计不足,对苏联社会的道德准则、理想和成就持怀疑主义态度”。但是《新世界》坚持原来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局采取组织措施,改组该杂志编辑部,于是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辞职。主编职务由科索拉波夫接任。

苏联当局虽然也要求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保持警惕,但认为《青年近卫军》的说法过于夸张,同时很不喜欢它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复古倾向。据说,当时勃列日涅夫就曾经抱怨打开电视机就听见教堂的钟声和看到教堂的圆顶,问道:“同志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是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①另一方面《青年近卫军》发表了一些肯定斯大林的功绩和三十年代成就的文章和诗歌作品,当局认为这是违背二十大路线的。于是该杂志的主编尼科诺夫也被调离。

事情并不到此结束。当时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支持对《青年近卫军》的批判,该杂志主编的调离和编辑部的改组,与他无不关系。1972年他亲自出马,在《文学报》

① 转引自亚诺夫:《俄罗斯思想和2000年》,《涅瓦》1990年10期,第154页。

(11月15日)上发表了题为《驳反历史主义》的长文,对所谓的“新乡土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文章指出,对知识分子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以超阶级的、‘全人类的’立场考察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它绝对化起来,把知识分子宣布为社会的领导阶级;另一种则认为,无论是科技革命还是知识分子,不管其社会本质如何,都应一概加以谴责。一个以全球性的世界主义为其特点,另一个的特点则是民族的狭隘性”。文章指责某些人鼓吹“渊源”论,“气势汹汹地颂扬农民的旧宗法制传统来对抗城市文明”,把旧农村说成是“培养民族文化和某种‘全民族道德’的主要基础”,把宗法制生活方式和旧俄的生活习俗当作“基本的民族财富”加以“赞赏和盲目崇拜”。文章直接点名批判了洛巴诺夫、柯日诺夫、安宁斯基、兰希科夫等批评家的观点。同时文章还列举一些诗歌和小说,批评这些作品的作者赞美教堂、十字架和圣像,“为几匹马流泪”,为“在莫斯科听不到雄鸡啼鸣”而发愁,把城市和工业描写成“某种抽象的‘恶’和‘铁’的形象”,把它们说成是“扼杀民族独特性”的东西。接着文章进一步指出,“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一种思想立场,这种立场的危险性在于它客观上包含着想要恢复过去的企图”。文章在引用列宁的有关论述后说,这实质上是“同列宁对农民的辩证看法发生争论”,是“同改造农村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争论”,并且责问道:“我们那些热衷于宗法制农村的人究竟在跟谁作斗争?他们要把我们召唤到哪里去?”文章对《青年近卫军》杂志上的某些文章提出批评,指责它们“用‘合流论’的精神来考察文化遗产,而且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实际上一方面美化和颂扬罗扎诺夫^①和列昂节夫^②这样一批

① 罗扎诺夫(1856—1919),俄国哲学家、政论家和批评家,曾宣扬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维护君主专制。

② 列昂节夫(1831—1891),俄国后期斯拉夫派作家、政论家和批评家。他认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生活的“市侩化”和对普遍安乐的崇拜是主要危险,宣扬所谓的“拜占庭主义”。

反动政论家，而另一方面对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采取藐视的态度”。文章训斥某些人以超阶级、超社会的立场对待历史，说他们轻视列宁的“两种文化论”，“直接跟列宁唱反调”；指责某些人有意地美化过去，“替‘本民族的’大公、封建领主、沙皇歌功颂德”。在谈到民族关系时，文章强调要对“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表现作坚决斗争，不管它是地方主义还是沙文主义，不管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排犹主义，不管它是民族妄自尊大还是民族闭关自守”，并且指出，“关于超阶级的‘民族精神’、‘民族感情’、‘人民的民族性格’、‘天然整体感的召唤’的种种议论”都是民族主义倾向的表现，应对它们采取“不妥协的态度”。

这里不惜篇幅引用雅科夫列夫这篇著名文章的话，目的之一是为了说明当年的雅科夫列夫和今日的雅科夫列夫之间的区别。将近二十年后的他已经“醒悟”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可是当年他却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俨然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奇怪的是，他却丝毫没有发觉（！）自己的这种变化，居然于1989年大言不惭地说：“当年写的文章，我一个字也不收回。今天事件的发展再一次证明1972年我是对的。”

在雅科夫列夫写文章的时候，《青年近卫军》的问题应该说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了，为什么他还要大动干戈呢？从大的方面说，当时苏联领导集团内部正在酝酿与西方的“缓和”，《青年近卫军》杂志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所提出的闭关自守的主张与此不相适应，同时也不合领导集团上层某些希望扩大与西方交往的人的胃口。观点与自由派相近的雅科夫列夫看准了这一点，想通过对《青年近卫军》的进一步批判，影响领导集团的决策。但是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在领导集团内部也有《青年近卫军》的支持者，而且当时苏共中央文化部长沙乌罗就站在《青年近卫军》一边。结果雅科夫列夫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没有因此而登上他所向往的、空缺了两年有余的宣传鼓动部部长的宝座，反而被调

离该部，于1973年出任驻加拿大大使。

苏联文坛上的三派，即自由派、正统派和传统派所进行的公开的论战，到此才暂时告一段落。自由派因特瓦尔多夫斯基辞去《新世界》主编职务和不久后病死，失去了自己的舆论阵地，势力遭到削弱。在这之后的《新世界》因主编易人和自由派编委的离去，已失去了昔日的特点。自由派中的一些人，例如批评家维诺格拉多夫、拉克申等人，转入文学研究领域，对当代文学问题暂时保持沉默；另一些人，例如作家沃依诺维奇、弗拉基莫夫等，则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正统派也因其首领柯切托夫于1973年逝世，作为一个派别的活动已大大减少，影响也有所减弱。传统派却出人意料地不仅保住了他们原有的阵地，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青年近卫军》的主编尼科诺夫被调离后，继任主编的是与他观点相近的阿纳托利·伊万诺夫。不久，原来担任《青年近卫军》副主编的维库洛夫被任命为《我们同时代人》杂志的主编，许多原来为《青年近卫军》撰稿的人，纷纷向该杂志靠拢，于是这家杂志逐渐成为传统派的喉舌。

总的说来，从六十年代中期起，苏联当局不断调整文艺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反对所谓的“两种极端”，对自由化和复古的倾向进行了某种遏制，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进行了镇压和限制，结果使得七十年代苏联文坛上出现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派别的界限和派别斗争变得不像过去那么明显。当然，这并不是说问题已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其实原来存在的各种思潮和倾向只不过是暂时被压下去而已，它们还时刻在寻找表现的机会。文学界内部的矛盾和派别斗争也依然存在，暗中的斗争一直不断，而且有时也公开表现出来。例如在1979年12月21日召开的一次主题为“古典作品和我们”的讨论会上，不同思想倾向的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争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现代艺术家对古典作品的解释和处理问题、如何处理继承本国文化传统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的问题以及如何评价现代

主义文学的问题。会上也反映出某种反犹的情绪。在七十年代创作中，美化旧农村和宗法制生活习俗的作品仍时有所见；在文学批评中，原来属于传统派的批评家仍寻找机会发表他们的观点。这里应提一下洛巴诺夫的一篇题为《解放》的文章（发表于《伏尔加》1982年第10期）。作者在这篇评论阿列克谢耶夫的长篇小说《爱打架的孩子们》的文章里，除了分析这部小说外，还谈到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把这部小说与其他农村题材作品对立起来，贬低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洛巴诺夫认为，“俄国文学自古以来的传统是肯定农民中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基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是从农民的、人民的生活之中产生的”，因此他对其他的题材持轻视的态度，否认那些描写国内战争、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有创新之处，说它们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洛巴诺夫的文章发表后，遭到许多作家和批评家的反对。尼古拉耶夫、奥斯科茨基等人分别在《文学报》和《文学俄罗斯报》上发表文章，批判洛巴诺夫的观点。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处于1983年2月8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洛巴诺夫的文章。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在会上发言，对洛巴诺夫提出批评。这次书记处会议作出的决定认为《伏尔加》杂志刊登洛巴诺夫的文章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求各文艺杂志的主编和编委“提高责任心”。^①《伏尔加》杂志的主编帕利金随即被解除了职务。这是八十年代上半期相对平静的文学界出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

七十年代下半期，苏联文坛上出现了一批玩世不恭、蔑视传统的审美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年轻作家，他们同所谓的“第四代作家”中的某些人以及其他持类似态度的中年作家一起，成为一支不小的力量。1979年他们编辑出版了文集《大都会》，这是他们显

^① 据《文学俄罗斯报》（1992年3月13日）报导，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书记处已于1992年3月撤销了这个决定。